一九八四年清史研究回顾

薛瑞录

近几年来，我国清史学科的发展，有一个日新月异的可喜势头。一九八四年一年内，学术专著、论集和工具书争相问世，琳琅满目。如戴逸主编的《简明清史》第二册，王思治主编的《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一卷，郭蕴静的《清代经济史简编》，秦佩珩的《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朱东润的《陈子龙及其时代》，罗尔纲修订的《绿营兵志》，冯天瑜的《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清史研究室编的《清史论丛》第五辑，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编的《清史研究集》第三辑，福建省郑成功学术讨论会学术组编的《郑成功研究论丛》和《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韦庆远的《档房论史文集》。来新夏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清史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合编的《清史论文索引》，等等。有关清史资料的整理与出版也成绩斐然，如刘如仲等编的《林爽文起义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清史研究室编的《清史资料》第五辑，中华书局出版魏源的《圣武记》，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李聿求的《鲁之春秋》，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江日升的《台湾外记》，等等。

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中旬，全国各报刊发表清史方面的文章达四百余篇。许多论文观点新颖，史料翔实，颇有深度。

本年度，《清史研究通讯》出版了四期，刊出四十多篇文章，报道各方面的学术信息，进一步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为一九八五年充实内容，增加一倍篇幅，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奠定了基础。

这一年还召开了一系列涉及清史方面的学术会议。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在北京召开的《清代通史》（1—6卷）分卷主编会议、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召开的清史学术交流会、山西太原的傅山学术讨论会、江苏常州的赵翼学术座谈会、广西藤县的袁崇焕学术讨论会、广东肇庆的明清广东经济学术讨论会和上海的会党学术讨论会等。

王戎笙在《清史研究通讯》上连续发表《台湾清史研究一瞥》，为大陆学者提供了有关台湾清史界的某些研究信息。

因此，各种著述增多，学术交流频繁，研究领域扩大，是一九八四年我国清史研究的明显特点。

现分下列专题，评介如次：

一、关于社会经济史。这方面的研究依然保持深入发展的趋势。除郭蕴静的《清代经济简史编》一书，对清代前期的社会经济作了综合研究之外，研究者们主要围绕这样几个课题而进行广泛探讨：

城市经济。近几年来，愈来愈多的学者把注意力转向城市经济史的研究。王家范的《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一期），从市镇的勃兴及其分布密度、市场结构和市场网络两方面，考察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苏松常、杭嘉湖地区）的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他不同意有些论者倾向于认为市镇与以往的消费城市在性质上无多大差异的观点，认为“在封建社会后期（自北宋起）崛起的江南市镇，带来的是当时经济先进地区一江南农业经济的显著发展与经济结构变革的重要讯息，显示着农业与手工业间以及它们各自领域内专业分工的扩大，乡村人口向镇市的转移，区域经济与市场网络的形成等等引人注目的变革迹象”。何荣昌的《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苏州大学学报》第三期），依据方志资料，对江浙地区市镇的兴起、发展、特点和作用加以论述。朱宗宙的《清代前期扬州城市经济》、梁淼泰的《明清时期景德镇城市经济的特点》（《南开学报》第五期、吕作燮的《明清苏州的会馆和公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二期）和王廷元的《论明清时期徽商与芜湖》（《安徽史学》第四期）等文，也都研究了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及其特点。

人口问题。这是近几年来国内外学者十分关注的课题。本年度又发表了一些很有份量的论文，如郭松义的《清代的人口增长和人口流迁》（《清史论丛》第五辑）、美籍华裔学者李中清的《明清时期中国西南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同上）、胡果文的《论清代人口膨胀》（《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二期）和蒋德学的《试论清代人口编审的几个问题》（《贵州社会科学》第四期）等。郭文利用档案、实录、方志、文集、奏稿等史料，对清代人口增长及其所产生的矛盾、各地人户流迁的情况、清政府对流迁人户的政策、人户流迁的意义和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论述。李文则以丰富的史料和多样的图表，系统地分析了明清两代中国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情形，认为“从康熙三十九年至道光三十年，中国西南人口增长主要是因为经济机会的增加。而不是因为农业技术的改进和可耕地的扩大，由此，非农业劳动者的比例起了很大变化，从百分之五增至百分之十”。

地租形态。这方面的文章为数可观，学术水平也较高。吴量恺的《清代的农民永佃权及其影响》（《江汉论坛》第六期），专门探讨了永佃权问题，认为“清代农民永佃权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封建社会晚期阶段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而其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这种农民永佃权一般都拥有全部或部分田面权，即对土地的经营、使用权”。余也非的《明及清前期的官田地租形态》（《重庆师范学院学报》第一、二期），则专门论述了明清时期官田的地租形态，认为“明及清前期，一般官田和屯田均属于佃农制范畴，明代的官庄庄头制和清代的旗田庄头制，都逐渐在向佃农制转化，其地租形态则逐渐由实物地租转化为货币地租”。周远廉、谢肇华的《清代前期的实物分租制》（《清史论丛》第五辑），对清代实物分租制的流行地区、具体形态、长期延续的原因及其性质和影响，作了全面论述。彭超的《试探庄仆、佃仆和火佃的区别》（《中国史研究》第一期），不同意把庄仆、佃仆和火佃看成是一码事的观点，进而分析了这三者之间在性质上的区别。刘守诒在《清初关内官庄建立的情况和性质的探讨》（《清史研究集》第三辑）一文中，对清初设立的老圈庄和投充庄的情况及性质作了新的探索，认为老圈庄从一开始就大量存在封建租佃关系。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这是个老问题，但近几年的研究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有明显提高。研究的重点也已从手工业、纺织业和商业方面，延伸到了农业、盐业和矿业等部门。黄冕堂的《略论清代农业雇工的性质与农业资本主义的萌芽》（《清史论丛》第五辑），论述

了清代农业雇工产生的历史条件、清代农业雇工的“自由劳动者”的性质和农业雇工经营的产生与规模等问题。景甦的《论清前期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认为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标志，则是较多的“自由劳动者”同时被雇佣在生产中形成协作，以及生产资料所有者以生产大宗商品为生产目的；摊丁入亩政策促进了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为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清前期出现的经营地主是我国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主要形式。彭雨新的《清代前期云南铜矿业及其生产性质的探讨》（《武汉大学学报》第五期）、柯建中的《略论明清时期封建地主阶级的变化》（《社会科学研究》第三期）和许丽娟的《明清时期中国与英、法专制政权的差异及其对资本主义萌芽的不同作用》（《学术研究》第二期）等文，也值得一读。

财政金融。这是清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之一，本年度有所改观，开始了一些新的研究课题。彭泽益的《清初的榷关地点和贸易量的考察》（《社会科学战线》第三期），对清初的几个榷关地点及其贸易总量进行了新的探讨。吴建雍的《清前期榷关及其管理制度》（《中国史研究》第一期），依据清朝的关税档案，论述了清榷关制度的演变及其作用。何本方在《清代户部诸关初探》（《南开学报》第三期）一文中，对户部各关的概况、性质及其历史作用进行研究，认为“诸关的财政意义在遂渐扩大，……其税课成为清王朝不可或缺的重要财源之一”。薛瑞录的《清代养廉银制度简论》（《清史论丛》第五辑），谈到了雍正创立养廉银制度的原因、内容、作用和局限性。王光越的《乾隆初年钱价增昂问题初探》（《历史档案》第二期），则对乾隆初年钱价增昂的概况、清廷平减钱价，措施及钱价增昂的原因作了初步探讨，乾隆平减钱价的措施是（一）添炉鼓铸、增加制钱数量；（二）严禁私毁制钱；（三）加快制钱流通速率，加大制钱投放数量；（四）严禁贩运钱文。

漕运与盐政。过去对漕运的研究不够，本年度稍有起色。《江汉论坛》第一期上，同时发表了熊文斌的《清代河运向海运的转变》、殷宗浩的《<清史稿·漕运>订补六则》两篇文章。熊文论述了清代由河运向海运转变的原因、清廷内部关于河运、海运的论争以及河运向海运转变的实施情况等三个问题。殷文则具体地订补了《清史稿》中有关漕运方面的漏。盐政方面的文章，主要有彭泽益的《自贡盐业的发展及井灶经营的特点》（《历史研究》第五期），论述了清初以来四川自贡盐业的发展状况和经营形态。林永匡的《清初的山东运司盐政》（《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第四期）和《清初的两浙运司盐政》（《浙江学刊》第一期），均依据大量档案史料，探讨了清政府为整顿山东、两浙的盐政而采取的措施及其成效。

二、关于政治史。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涉及了清代的政治制度、皇权斗争、秘密结社和农民起义等内容。

李鹏年、朱先华等人编著的《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一书，在研究的基础上，详细地介绍了清朝七十八个中央机关的职能及其演变。南炳文的《清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阶段和特点》（《南开学报》第三期），认为清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过程有三个，即顺康时期发展水平低于明朝的阶段、雍正到咸丰时期发展水平居历代之首的阶段、同治至清末时期发展水平有所降低的阶段。季士家的《浅论军机处与极权政治》（《清史论丛》第五辑），从军机处设立时间与发展过程、军机处的组织机构、军机处的性质与作用等方面加以论述，认为军机处成立于雍正七年（1729年），经过“军需房”、“军机房”、“军机处”三个发展阶段。杨锦麟则另辟蹊径，对清朝的普通官吏一笔帖式的地位和作用加以研

究，写出了《笔帖式与1673—1683年清朝决策系统》一文，认为“1673—1683年清朝决策系统为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构成了必要的前提，笔帖式所发挥的信息反馈作用，为该时期战略决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切实保证”。

林乾的《论康熙时期的朋党及其对清初政治的影响》（《松辽学刊》第一期），以康熙时期几个重要朋党集团为研究对象，论述了清代前期党争的特征，即：（一）满族贵族是党争的核心力量，（二）“满汉”之争是党争的重要内容之一；（三）党争与皇位继承的争夺紧密相连。许曾重的《曾静反清案与清世宗胤禛统治全国的大政方针》（《清史论丛》第五辑），与他发表过的《清世宗胤禛继承皇位问题新探》（《清史论丛》第四辑）一起，可堪称为姐妹篇，均是研究雍正史的佳作。该文认为雍正在处理曾静反清案中，主要想解决下列三个问题，第一、清除关于他“矫诏得位”的蜚语及其所产生的恶劣影响；第二、从理论和史实上论证清朝统治中国合的理、合法，以消除部分汉人的反清情绪，并通过释放曾静和对吕留良等人的严厉镇压，打击、分化反清分子；第三、整顿部分绅衿士庶的“不良”风气。杨向奎在《论吕留良》（史学月刊》第四期）一文中，通过吕留良案与雍正继承皇位问题的考证与分析，认为“雍正满以为经此剖白，可以维持信誉于天下，但谋父逼母，纳父妃于后宫，残戳诸兄弟，种种恶行，非仅言语所能洗刷者；参汤致死，涂“十”为“于”，非隋炀故技？而其后隆科多与年羹尧之遭遇更可以说明雍正之夺嫡，实有难言之隐”。近几年来，史学界对于雍正夺嫡问题的争论相当热烈，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相持不下。看来人们对这一重大疑案的研究将继续深入下去。苏和平的《试论清初三藩的性质及其叛乱失败的原因》（《甘肃社会科学》第五期）和李尚英的《康熙平定三藩及其善后措施》（《学习与思考》第六期），则对清廷平定三藩之乱的历史意义作了初步研究。

秘密结社和农民起义。本年度发表这方面的文章不太多，比较重要的有赫治清的长篇著述《论天地会的起源》（《清史论丛》第五辑）、李建等人的《王聪儿起义》和黎邦正的《四川白莲教起义与社会经济的关系》等。赫文以丰富的史料，独到的分析，从天地会创立的宗旨、清朝刑律有关“歃血结盟”条款的演变，清朝官方文书档案和天地会本身文件记载这四个方面，来论述天地会的起源问题。同时，还对国内外的各种说法与争论进行辩析，最后得出结论：“天地会源远流长。万提喜虽是乾隆年间在闽粤传播天地会的重要首领，但他不是该会的创始人。洪二和尚万提喜和天地会内所称起会人‘洪二房和尚’也不是一码事。天地会是在清初反清复明的秘密结社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是当时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由民族矛盾向阶级矛盾转化的过程中的产物，正式成立于康熙甲寅十三年(1674年)”。黎文则着重分析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与农民起义间的关系，认为“四川白莲教起义军的最大特点，就是有大量的流氓无产者参加，削弱了农民军的力量，这个局面的形成，在于清中叶四川不发达的社会经济”。

三、关于思想文化史。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中，首推冯天瑜的专著《明清文化史散论》，该书全面地论述了明清时期的中国文化，涉及了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视野宽广。其中对明末清初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的学术思想、明清文字狱、明清类书、丛书的编纂等皆有精辟的论述，勾勒了明清时期文化发展的轮廓。全国一百二十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傅山学术讨论会，并向大会提交了近九十篇论文。与会者就傅山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而展开了讨论，达到了比较一致的意见。许多人认为傅山的学术思想及其在诸子学、金石学、音韵学、训诂学、诗文、字画和医学等方面的成就，为同时代的王、黄、

顾、孙、颜诸位大师所不及。本年度所发表的数十篇有关傅山的论文，大多论述了他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史学思想、美学思想等。姜广辉的《颜李学派的功利论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社会科学》第五期），认为颜李学派是清初反理学思潮中的一支异军，这一学派摒弃了理学的思辩方法，倡导经验论的实证方法，建立起崇尚艺能、以用为学的功利论体系。颜李之学对后世思想界发生过重要影响，它的历史命运是与近三百年中国历史的发展相关联的。

四、关于历史人物。本年度对清代历史人物的研究与评价空前活跃，据笔者粗略统计，共发表了一百七、八十篇文章，论列了上百个重要人物，超过了经济史、政治史方面的论文数量，第一次跃居首位。这是一九八四年我国清史研究中的一大变化。有不少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升华，有些文章对难度较大的历史人物的研究也有突破，特别是有的文章研究了过去重视不够的人物，从而起到了填补空白的作用。《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一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多尔衮、孝庄文皇后、范文程、冯铨、孙奇逢、朱耷、巴图尔浑台吉、达赖五世、玉林琇、汤若望、于七、马士英等五十一位著名人物作了认真研究，实事求是地写出了他们的传记。《郑成功研究论丛》和《郑成功研究论文选》共刊载了五十二篇文章，更加深入地研究了郑成功及其有关人物郑芝龙、郑经、郑克塽、施琅、陈永华等。这些论文有力表明：近年来，我国史学界已把对郑成功及其政权的研究推向了新阶段。洪承畴是个复杂而有争议的大人物，最近几年对他的研究加强，且趋于基本肯定的观点占上风。李鸿彬的《试论洪承畴在清初统一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史学集刊》第三期）和李新达的《洪承畴述评》（《清史论丛》）第五辑），都持有同样的观点，他们认为评价洪承畴应坚持历史唯物论，既要否定他参与镇压明末的农民起义和清初的抗清运动，又要肯定他归清之后，积极投身到统一全国的历史洪流中去，并作出了历史贡献。对范文程的评价却引起了争鸣，常建华在《也谈对范文程的评价—与张家哲同志商榷》（《上海社会科学》第四期）一文中，不同意张文全盘定范文程的论点，认为对范的评价不单是对他一个人的问题，还牵涉到明清之际很多历史人物的评价，牵涉到民族关系和清代前期的历史地位；范被掳入后金以后，为满族的封建化作出了贡献，清廷入主中原后，他又辅佐顺治、康熙，继续作出贡献，这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是有利的。清初的三大思想家王、黄、顾，仍然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魏鉴勋、袁闾琨在《清初三大思想家爱国主义辩析》（《光明日报》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一文中提出新见，认为王、黄、顾的爱国主义精神不是表现在抗清复明的事业上，而是蕴含在经世致用的主张之中。陈祖武的《黄宗羲、顾炎武合论》（《贵州社会科学》第五期），鉴于人们对黄、顾的评价有歧异，故对他俩的学术、行事和思想进行比较，认为黄"大节无亏，他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应予以历史地肯定"；顾"始终以'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为怀，北游之后，亦无丝毫消沉和颓丧"。陈子龙是明末清初的爱国志士、文人，过去研究甚少，朱东润写了二十四万字的专著《陈子龙及其时代》，对陈的一生作了全面论述。王紫稼是位昆剧表演艺术家，何龄修特撰《关于王紫稼》（《清史研究通讯》第三期）一文，以生动的笔触，考证了王紫稼的生卒年份，评述了他的艺术活动及其在昆剧表演史上的地位，补正了孟森《王紫稼考》中的不足。对清朝皇帝的研究也推进了一步，如王思治的《皇太极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第三期）、金成基的《论顺治》（《文史哲》第五期）、邢玉林的《康熙的哲学思想》（《辽宁大学学报》第四期）、杨乃济、冯佐哲的《雍正帝的祥瑞观与天人感应说辩析》（《清史论丛》第五辑）学

夏家骏的《乾隆惩贪述评》（《求是学刊》第一辑）和关文发的《评嘉庆帝》（《武汉大学学报》第四期）等文，均有独特的见解。此外，对清朝一些开国勋臣的研究亦有起色，如陈涴的《论代善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社会科学辑刊》第五期）、孙文良、李治亭的《清开国勋臣何和礼》（《社会科学战线》第二期）、郑玉英的《宁完我简论》（《社会科学辑刊》第二期）和张嘉沧的《略论入清后的冯铨》（《史学月刊》第二期）等文，也值得一读。

五、关于民族史。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清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巩固与发展，因之，研究和总结清朝在民族政策诸方面的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马汝珩、马大正在《渥巴锡承德之行与清政府的民族统治政策》（《新疆大学学报》第一期）一文中，叙述了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刚从俄国返回祖国，就前往承德会见乾隆帝的经过，进而论及清政府收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王希隆的《乾嘉时期清政府对哈萨克族之关系与政策》（同上），针对苏联史学界有人认为清政府对哈萨克族的统属关系是由于施加军事压力的结果，从政治、经济和历史诸方面来论述清政府同哈萨克之间的密切关系。马汝珩在《略论新疆和卓家族势力的兴衰》（《宁夏社会科学》第三期）一文中指出："和卓家族作为一种宗教势力和社会力量，在清朝前期我国新疆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和作用。其势力的兴起与衰落有力地改变着新疆地区的政治形势、民族关系和宗教信仰的历史过程。"张捷夫《关于雍正西南改土归流的几个问题》（《清史论丛》第五辑），不同意所谓"改土归流的过程就是残酷的战争过程"的说法，认为"雍正年间清王朝在西南进行改土归流的过程中，所进行的几次较大规模的用兵，时间不是在改土归流之前而是在改土归流之后，起因是土司势力不肯退出历史舞台，而进行拚死的反抗。因此，既不能认为土司的这种行动是正义的，甚至被说成是农民起义，也不能得出清王朝对土司的这种战争是反动战争的结论"。

另外，本年度在史学史、文学史、军事史、科技史、法制史和对外关系史方面，也发表了一些文章。因限于篇幅，故不赘述。

八四年的清史研究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在数百篇论著之中，有关理论探讨和研究方法论方面的文章显得太少；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课题，如财政、金融、漕运、水利和对外贸易等，仍未出现瞩目的成果。少数文章质量较差，缺乏新意。这就需要我们继续作出不懈的努力。

《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一卷评介

朱金甫

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王思治教授主编的《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一卷，已由中华书局排印出版了。全书共辑入王思治、马汝珩、李鸿彬、金成基、林毓辉、王政尧、张晓虎等十六位作者所撰写的四十九篇清顺治以前的五十一名历史人物传记，约二十四万字。其中有后金和清初的帝王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及多尔衮等人，将相阿敏、济尔哈朗、多铎、范文程、冯铨等人，部院大臣车克、赵开心、杨义、魏裔介等人；有少数民族